

# 中国经济的“好牌”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

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与其他国家相同阶段类似的增速下调,增长前景如何可谓见仁见智,国际上甚至还不时兴起一阵“中国经济崩溃论”,这种极度悲观的看法显然是非理性的。全面考察,我认为仍可形成如下乐观取向的判断: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羊”,中国的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历史潮流,会提供一系列的发展机遇。

## 阶段转换与奋斗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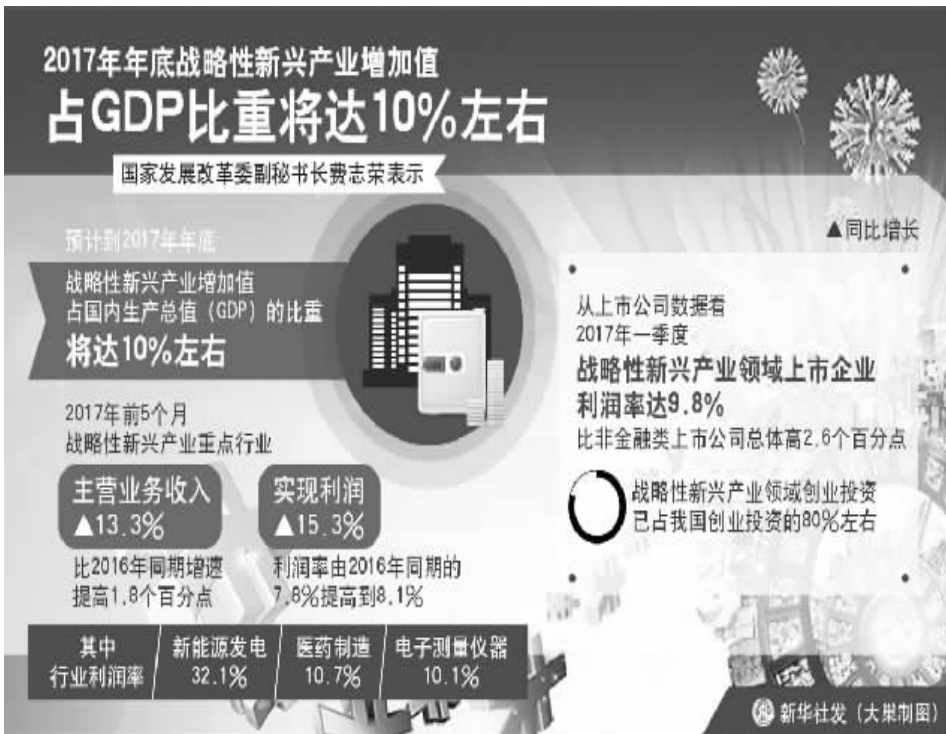
我们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新发展阶段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看到市场预期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阶段转换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有待实现。我们已经确切无疑地告别了GDP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确切无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位置。其后,中高速增长新阶段的到来,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总体来说,各个经济体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实现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橄榄型”)的结构,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过多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使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则一定会按照成长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具体推进中,“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将继续向前,力求以十年左右的时段,以6.5%左右的年均增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一直延伸到使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在2050年前后见分晓。

##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新”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出现



“告别高速”的阶段转换之后完成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时间段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其预测,强调如果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中国经济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方法,也有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这样乐观,看低的也有认为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调“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最为关键的结构优化上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中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处理好。

如何能把结构优化问题处理好?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驱动”。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如能够形成,需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完成供给侧的要素优化重组和新旧动能的转换。只有创新才能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只有创新才能达到结构优化,形成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

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要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特征。

这方面如果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层次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上是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技术方面潜力,以及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中争取通过进一步一步的追赶,“后来居上”,最后走到现代化的前沿。

## 经济发展的“好牌”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时期三十余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1%,工业化总体而言处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却又方兴未艾。我认为中国现在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许多张好牌的。

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正

积极推进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业已雄厚起来的民营企业一起拉进与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实施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乃至做产业新城、综合新区的连片开发。这些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对此类项目稍作考察与选择,会发现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与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的开发与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老中心区建设中诸如综合管廊、立体停车场,以及“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大量的事项。需要的投入要素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中的钢铁和水泥、机械与设备等。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术力量。这些我们一样都不少,而且正好发挥其相关的潜力。

中国的生产要素在国内统一市场的眼界之内,以及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互动的眼界之内,都不缺乏。很多基本要素被指责为现在处于过剩状态,但如果比较快地组织一批有效投资,一定会相当迅速地把一些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这方面的安排,可体现为结构优化和适应现代化升级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边必须处理好投融资的问题,毕竟有时间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设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体现出来。怎么处理衔接问题?这又是对科学决策和机制创新的考验,但毕竟空间在、机遇在,经验也正在丰富。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新常态的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必须匹配好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到底我们这样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够如愿推进?有种种的挑战、难度和考验。但毕竟跟挑战、考验而来的是机遇。如果从“事在人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看重机遇。

从投资、消费、贸易等视角作实际的观察、市场的调研,可知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这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会提供一系列的发展机遇,后面跟着的是中国现有相当基础的由收入增长、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等方面支撑起来的消费升级浪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成长大的框架中虽然有不确定性,但能够看到与潜力相伴随着的机遇、考验和发展的宝贵空间。

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如果您看到三年左右视界之内的不确定性,而未认清三十年视界之内中国攻坚克难走向现代化的确定性,那么就可能弱化自己的准备意识,而错失参与并共享中国这一方兴未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 大宗商品市场有望持续升温

□兰格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陈克新

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L”型企稳态势已经确立,由此奠定大宗商品市场向好基础。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供应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进口保持巨大数量规模,市场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行业利润明显增加,企业积极增产,相关板块成为股市“龙头”。展望今后市场形势,除了既有积极因素继续发挥效应以外,又有新的“乐观猜想”,由此促进大宗商品市场继续升温。

一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近期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传达出一项重要信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是说,目前及今后的所有金融改革、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都不能偏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核心目标。这有利于货币资金摆脱“自我空转”,“由虚向

实”。而实体经济的增长,势必奠定大宗商品市场繁荣基础。

二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以及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取得了很大进展,据统计,到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201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4%。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统计,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100万—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有121个。即便如此,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差距,与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比,城市数量都显不足。因此,现阶段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远没有达到已完成的阶段。伴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与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型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梯次转移,伴随着大量经济产业转向既有城市,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将会大量涌现,借此实现上亿农村人口进

城定居,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实现全国各地区平衡发展。

更多大城市的涌现,将会在一些地区出现世界级城市群,需要实现这些城市群的互联互通,激发巨量基础设施投资。最近,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上报发改委,而浙江亦在谋划环杭州湾大湾区,得到上海的积极响应。中国大湾区的建设规划牵涉到沿海众多经济发达省份,势必为其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建设推上一个更高阶段。更加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能源供水体系、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等,将激发万亿级基建投资,这就使得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增添巨大潜力,激发未来巨大规模的金属、矿石、能源等商品需求。

三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迎来高峰。现阶段全球供水、水利、电力、交通、环保等方面基

础设施存在巨大欠账,因此成为困扰当前及今后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预计未来几年世界各国政府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量资金。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未来几年全球每年平均流入基础设施的资金将在2.5万亿美元。经合组织的估算数值则更高,认为从2016年到2030年平均每年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大约为6.3万亿美元。

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将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全球范围内金属材料、施工机械、能源化工等商品需求旺盛,进而推动中国物资出口,包括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工程机械、重型卡车与相关设备)两个方面。二是迅速增加矿石、石油、煤炭、橡胶等初级产品需求,致使国际相关产品价格坚挺或者上涨,从而提高中国成本。

难以承受。这一次泡沫还是无法持续,到1929年泡沫破裂。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与科技浪潮的发展不无干系。由硅谷巨头们创造的惊人财富,也必须流向某个领域,这一次被投入房地产中,形成了巨大的泡沫。飙升的房价令人们忘乎所以,纷纷以房产作为抵押品从银行套现,助长了泡沫的进一步膨胀,结果迎来了金融海啸。

当下,金融海啸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早已平息,可事实上,那只是用货币宽松、超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刺激,暂时掩盖了危机,之前引起危机的原因并没有解决,后续全球经济向何处去,仍有待观察。

## 互联网平台助推供给结构改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刘诚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动能的体量正在不断集聚,当超过旧动能的减少量时,经济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其中,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

## 引发需求转移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大约为22.77万元,占全国GDP的30.61%。企业接入互联网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单个企业的需求,发生需求的转移,即从实体店转移至网店,或者说从传统企业转入互联网平台。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平台企业不一定比实体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其在搜寻匹配、信息传输、物流等方面具有快速、便捷以及低成本优势。所以,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旧动能转变的表现。企业使用互联网平台主要有三种形式:入驻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平台、自建平台、电商全产业链。

目前,互联网平台对于市场总需求的作用仍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网络约车、网上销售、网上融资等只是将线下活动转移至了线上,是一种替代性增长,并未拓展原有增长空间。避开需求端的争议不谈,我们认为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善供给端的产品、企业和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 有利于改善供给结构

从供给端来看,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善供求结构,让供给可以低成本地迎合需求,产生较少的匹配成本和交易费用;同时,高需求产品会增加而低需求产品会减少,企业会相应的增产、减产甚至破产,产业方面则出现新业态的诞生和成长、过剩和落后行业的萎缩和转型,即产品、企业和产业都会更上一层楼。这是一个供给结构调整的长期过程,适合需求的产品生产增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企业会加大研发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层次。不适合需求的(或者没有接入平台而导致需求萎缩的)企业的生产空间缩小并逐渐淘汰。供给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例如某酒店企业可以根据携程订单情况调整大床房和标准间的比例结构,某钢铁企业可以根据网上订单生产特殊型号的钢铁制品。可见,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主要是调结构而非扩内需,这可能是平台的真正价值所在。

以传统制造业为例,互联网平台催生个性化定制、低库存经济。当前,“互联网+制造业”日益深化,从原来仅仅利用信息系统优化生产组织,转向依靠云平台 and 工业大数据,将设计、制造、营销、服务与消费者需求无缝对接,“生产”正在超越企业的边界,越来越呈现开放的“平台化”趋势。互联网平台可以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拉近制造商和用户之间的距离,缩短传统生产模式中商品在进入生产前所需的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的信息收集,能够通过沟通真正高效地实现个性化、批量化、定制化的智能制造生产模式,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产能供求更加均衡。

当然,互联网平台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并非越大越好。平台是一个供企业和用户交易的双边市场,企业和用户都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平台才具有价值。例如入驻企业较少的平台,用户使用不够便利则将弃用该平台。同时,随着企业和用户的增多,平台的边际成本接近零,而其收益递增,故而平台具有强烈的扩张和垄断意愿,例如最近的顺丰和菜鸟之争。但是平台的垄断性,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并挤压了入驻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互联网平台的垄断问题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 优化互联网平台

第一,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加强平台的垄断管制。不同于以往产业变革依托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新一轮产业变革将更为依托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应通过建立国家高效能运算研发中心和高效能运算服务中心,加快高效能运算前沿技术突破,注重高效能运算的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对智能制造系统的支持。同时,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要洞察平台垄断的合理性边界,并区分平台实施的一般市场行为和垄断行为,对于过度攫取垄断利润的平台要从严治理。

第二,促进长期技术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电商,还包括教育、交通、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借此培育经济新动能。要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互联网经济对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强调的是,新经济的培育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旧功能被新功能替代不能仅是周期性变动,其过程有阵痛但必须长期坚持。

第三,利用互联网平台,改造传统经济。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商务和社交等生活类产品上,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滞后。我国面向企业的云服务渗透率与中小企业的互联网使用率与美国相比有数倍的差距。我国消费者电商化比例是50%以上,而传统企业电商化比例仅8%左右,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0%。今后应更加重视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将互联网平台与传统制造优势相嫁接形成智能制造,实现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做到按需生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加大消费补贴力度,提升互联网经济需求。当前我国年人均信息消费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10。即便在2020年实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的目标,人均消费也仅相当于巴西2014年的水平。我国之前的家电补贴和汽车补贴都得到了较理想的效果,而且国外实践也证明消费补贴比生产补贴具有更好的市场效率。例如,美德日等国为光伏产业提供了大量消费补贴,不仅避免了产能过剩,还提升了产品质量。所以,我国应该在互联网、电信等领域提供消费补贴,尤其是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这样既可以拉动互联网经济的市场需求,推动供给结构的改善,还可改善社会民生。